

流变与传承：

云南地方文化史论

袁国友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袁国友 著

流变与传承

——云南地方文化史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

张海翔^①

作为中国西南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云南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一直为世瞩目。这种多样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来说，云南的自然多样性特征源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与之相联的特殊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文化多样性特征的成因则较为复杂。人们或许认为，云南文化的多样性源于云南民族的多样性。这种看法，泛泛而言，似亦成立，但深究下来，却仅是表象之论。因为云南的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一样，本身是云南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殊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把民族多样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本源和依据。要揭示云南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成因，必须深入到云南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去探究和找寻。

近百年来，国内外研究者特别是云南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对云南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云南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勾勒出了云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云南文化演进的基本轨迹，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想法。学者们的探索和研究表明，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云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轨迹：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先秦和秦汉时代的古滇青铜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爨文化、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文化、元明清时期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和近代以来朝着工业文明迈进的新文化。云南历史文化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和独特性，同时又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文化的发展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和一体性，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整体性特征的反映和体现。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如秦楚争霸与庄蹻开滇、汉击匈奴与武帝在云南设立郡县、唐蕃

^① 张海翔，云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争斗与南诏建国、蒙古灭宋与蒙元在云南设立行省、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背景下的云南对外开放与近代化进程等。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马曜先生等的论著对云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统一性、地方性和独特性特征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阐释，使我们得以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云南的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问题。

袁国友教授的论著《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收入作者研究云南地方文化史及其他相关问题的40多篇学术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潜心思考、勤奋笔耕的结晶。作者青年时求学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师从谢本书教授、林超民教授等史学名家研习云南地方史，在各位名师熏陶下，打下了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之后，作者继承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结合时代发展主题和学术发展潮流，在云南地方文化史的若干重要领域和论题上，深入探索、不断拓展，取得了许多具有新意和创见的研究成果，如西南联大研究、近代昆明城市化问题研究、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研究、近代滇港贸易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等。通观《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一书，我有这样几点认识和感受：

第一，作者对云南地方文化史特别是昆明文化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使我们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的信息和启发。如作者通过对近代昆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指出，近代昆明城市化或昆明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变迁与近代云南特别是昆明地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他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是昆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两个时期，而这两个历史时段都是近代史上昆明和云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昆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重镇，成为沟通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重要桥梁，成为国际对华援助物质运输集散的枢纽和中心，是沿海和内地工商文教军政机构及其人员内迁西南的重要集中地，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原先相对闭塞的昆明在抗战时期处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态势中，这种开放态势为昆明及云南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抗战时期昆明及云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作者的这些看法，既是对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又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区域近代化发展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作者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与云南发展之间的特殊关系，抓住当前我国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机遇，促进云南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作者对云南历史文化特别是昆明名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传

承保护、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云南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共性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发人深省的观点和看法。作者认为，作为文明古国、文化大省、文化名城，中国的发展、云南的建设、昆明的变革绝不仅是经济的增长、产值的增加和市容的改观，而必须是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做好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做好历史文脉的延续工作，做好文化资源的利用工作，不仅是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经济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硬道理，历史文化保护也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作者对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传承、云南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学术创新意义、实践指导价值的观点和看法，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认识，推进了相关工作的建设和开展。

第三，作者以多维研究视野和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探讨云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设及相关论题的深入研究。比如，西南联大研究如今成为教育史和学术史研究中的热点论题，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本书作者就注意到了西南联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认识到了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他以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提出了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和奇迹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对西南联大历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比如，作者以现代解释学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解读分析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学研究，对方国瑜先生史料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和价值、理论和方法、史料目录学的现代学术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独到的解说和评论，认为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学研究是 20 世纪云南学术文化史上的重大工程，是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丰碑；史料目录学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文本解释学基础，史料目录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式的理性实证主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史料目录学研究方法，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此外，作者密切关注云南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对当代云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重要成果从学术史和方法论角度进行了介绍和评说，肯定其成绩，总结其特点，探讨了进一步创新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总的来看,《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展示了云南历史文化演进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了云南文化多样性特征的由来和内涵,论述了云南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展现了当前云南地方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论题和研究进展,反映出了云南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和治学特点,是一部学术性、思想性兼备而又独具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化史论集。《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的结集出版,将有助于云南地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益于云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读完《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成篇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和思潮不断嬗变的时期。从学术思潮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方法论热”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我感到学术研究的演进和学术思潮的发展,大体与这样一些因素密切相关:一是时代主题或时代要求;二是学科自身的基础和积累;三是学术范式或观念方法的转换与创新。学术研究的演进和发展,不是随波逐流的“无主题变奏”,而应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文化创造行为。“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一样,是推动学术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思潮交融激荡、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大时代有大使命、大主题、大趋势,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握住时代的使命、主题和要求,增强“学术自觉”意识,在学术创新、文化发展和时代进步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幸运。云南是自然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交集的地区,是农业文化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南亚文化的连接与交汇之地。作为云南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由农业文明向工明文明迈进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立消长的特殊时代,我们应该为云南农业文明的传承、工业文明的发展、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汲取,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2013年3月25日

目 录

滇史纵横

- 2 交融与统摄：汉文化在云南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流变与指归
- 12 爨文化：云南古代文化链的重要环节
- 22 方国瑜先生与爨史研究
- 50 抗日战争与云南：救亡与发展的双重变奏
- 63 西南联大：近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和奇迹
- 75 西南联大研究三题
- 82 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的象征
- 90 西南联大教师群体论析
- 101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云南
——梅贻琦、刘文典、朱自清、杨振宁在云南的生活岁月
- 120 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
- 132 伍集成与 20 世纪中期的旅港云南商人

昆明注事

- 162 历史文化名城
——昆明发展历程的回眸与扫描
- 197 昆明：城市史与城市化论纲
- 210 清代昆明地区商业发展变迁概观
- 224 近代化起步时期昆明古城的历史景象
——莫理循《中国风情》关于清末昆明的历史记录述评
- 243 1937~1945年昆明近代城市化的跃迁

历史反思

- 266 创造性的回应与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百年现代化之路
- 278 中国近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论纲
- 287 论吴虞的反孔非儒思想及其他
- 297 试论历史研究中的认知结构
- 307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

文化传承

- 320 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换与发展
- 334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生态环保意义：若干实例与分析
- 349 制约怒江水电开发的错误观念：非人本的自然主义环境观与非科学的文化保护观
- 362 云南地域特色文化概说
- 366 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开发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与思考
- 378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资源开发的思考与设想
- 388 云南历史文化名城资源开发的思考
- 393 论云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类型、特色和价值
- 404 “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背景下的云南旅游资源开发
- 413 石林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与构想
- 424 论民族题材电影的精品之路

学术评论

- 436 对发展繁荣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 450 关于加强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 464 方国瑜史料目录学的学术方法论及其意义
- 473 谢本书地方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述评
- 484 人生历程的实录
——评《龙云传》兼论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
- 493 透视历史 烛照人生
——读《张冲传》
- 496 为了新世纪红土地壮丽的日出
——读《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的启示与随想
- 498 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读《云南近代史》
- 503 一部开创性的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
——《云南抗日战争史》评介
- 509 读《中国民族史》的若干思考
- 517 寻求正义和平等的回声
——关于《杜文秀起义论集》的评论与随想
- 527 寻求一种认知与理解
——评《云南回族史》
- 537 云南农耕文化的精彩展示
——读《横断山 不横断：追寻云南千年农耕的足迹》
- 540 后 记

滇史纵横

交融与统摄：汉文化在云南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流变与指归

众所周知，云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是云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近年来，民族文化的研究、开发趋于兴盛，出版了许多以“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学”为题的论著，许多具有直观性和操作性的民族文化如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用具也日益被人们搬上舞台、餐厅和商店。

与此同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云南文化并非一个简单的“民族文化”所能统摄、涵融完毕的，云南文化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民族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云南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而其基调，则是中原汉族地区传入的汉文化。

对于汉文化在云南两千多年的文化流变中所具有的统摄与主干作用，近几年来，已有学者加以申说。林超民教授在《唐代云南的汉文化》文中指出：“南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诏文化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南诏文化是在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唐代云南文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着眼于其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同时也应注意到汉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脱离汉文化孤立地谈云南地方民族文化，要把握云南文化的本质与特点是不可能的。”^①金丹元教授在《云南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论》一中也指出：历史上云南地区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导向，即云南各民族文化在同各外来文化的交流时，始终将汉文化放

^① 林超民：《唐代云南的汉文化》，载《文化·历史·民俗》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在首位，有时甚至将汉文化置于与本民族文化平肩的地位，有意无意中视汉文化为正宗，或将汉文化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参照系数。”^①

事实上，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布以及云南地区各族人民对汉族文化的学习、汲取与融汇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漫长、芜杂，但也是隐然可寻的。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历史的回溯与透视，来追寻汉文化与云南各民族土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清理出一个云南历史文化演进、发展的大致轨迹。

一、花开并蒂：先秦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云南土著民族文化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先秦及秦汉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经过先秦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至春秋晚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形成了华夏族，华夏族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礼乐教化，与华夏族周围地区较为落后的戎夷蛮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经过战国数百年的纷争，华夏族的人口进一步扩大，其社会经济文化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华夏族成为秦人的主体。楚汉战争后，更为强大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王朝汉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前的华夏族这时也就成为汉人的主体。华夏族经过几千余年历史的因革损益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政治、语言、思想、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独特的民族生活要素，也就形成统一的汉文化。十分明显，至秦汉时期，华夏文化或汉文化已经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社会功能，在当时中国境内的各种民族文化中具有优势的地位，不仅对当时的汉族具有强烈的规范制约作用，而且对当时四夷各民族也已开始产生文化的辐射和涵化作用。

在中原地区汉文化正式成型并对汉族人民产生规范作用的同一时期，现今的云南地区，当时正处在所谓“西南夷”时期。两千年来，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关于秦汉时期云南地区各部族的分布状况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记载。从《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云南地区尽管各部族的势力范围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但是在现今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滇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程度，自夜郎以西，“滇最大”，并且已是“椎结，耕田，有邑聚”，“滇王

^① 金丹元：《云南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论》，载《民族文化学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者，其众数万人”。即使汉武帝派至滇国的使者，回到长安后也“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出降，汉王朝于是在滇池地区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令复长其民。对此，《西南夷列传》曾有这样的议论：“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印。滇小邑，最宠焉。”为何滇国及滇王能得到如此的恩宠，千百年来，人们对此一直是或暗或明，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才获得了全然的了解，这就是在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的滇国已创造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这种青铜文明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而这种青铜文化，在文化的内涵和指向上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旨趣各异的。

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云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大规模交往始于何时，中原华夏族——汉族的文化何时传入云南地区。在汉武帝以兵临滇、置益州郡以前，云南地区与内地交往的大事史有明载有这样两件：第一，庄蹻入滇。《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是：“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关于庄蹻王滇事，学术界素有争议。笔者认为，庄蹻入滇对当时滇池地区的文化并无太大的影响。据一些人的研究，庄蹻入滇应在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前后）^①，而在此时，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此之前，考古发掘表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江川李家山等地的青铜文化也已各具特色、鼎足而立，而江川李家山的一座墓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625±105年^②。这足以证明，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的。另外，《西南夷列传》又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姑不论庄蹻入滇后，滇王之位是否为庄蹻后裔一脉相承，即便如此，对滇池地区的文化恐也不会有太多影响，因为庄蹻及其部属入滇后，曾不得不“变服，从其俗”才能长之，况且楚国当时自身也是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之邦”，连楚王自己也自认为“我蛮夷也”。第二，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对于这件事，我们似乎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不仅秦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多年，而且即使至西汉武帝时，当时朝廷对滇池地区各部族的状况也是所知甚少，不明所以，处于道听途说的状态之中，直到以兵临滇后，各种情况才多所了解，这说明，

^① 参见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上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②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汉武帝以前，中原内地与西南夷地区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的，几乎没有太多的文化交流。

由上论说，我们可以看到，秦汉以前，无论是中原汉文化还是云南地区的各部族文化，均处在各自的初始发展阶段，各自都在完成自己的最初形态，其间虽有若干交流的努力，但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迎来自己的朝晖的。

二、五色交辉：西汉至隋唐时期云南地区的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

如果说在汉武帝郡县西南夷以前，云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域特征和历史发展内在固有的动因，与周围各文化圈没有进行过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流，而处于所谓“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文化态势的话，那么这也是历史发展自身的进程使然。在稍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看到，云南地区恰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民族分布而成为吸纳融合各种文化的天然交汇之地。对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说明。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云南的观音像》一文中即已指出：“他们（云南人）在思想意识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将亚洲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并使我们领悟到，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质都在这一炉中融化混和。”^①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国内地汉族地区传入云南地区的汉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之间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从成型走向成熟光大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一时期开端和结束的两个强大王朝汉和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而汉和唐都与当时的云南地区发生过极富文化意义的各种交往和交流，并且这种交往和交流对内地的历史进程和云南地区的历史发展都曾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历史影响。而这一时期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播迁和与云南各民族土著文化的交融接触便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史焦点。

在云南历史上，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伴随着益州郡的设置，云南地区与内地中央王朝之间自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余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

^① 转见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所附《云南的观音像》一文，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历史关系，这种复杂历史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并且政治与文化常常互为表里，构成了汉唐间汉文化与云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对于汉唐一千多年间云南地区的地方文化，人们多用爨文化和南诏文化来概称之。而爨文化和南诏文化恰恰表征出了这一时期云南地方文化的时代特色及民族文化特色。

这里，我们先概略地把这一时期云南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作一展示：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在滇池地区设置益州郡；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设置永昌郡；蜀汉时，南中大姓反，诸葛亮遣兵平定之，置庾降都督统领南中地区；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南中地区设置宁州，为全国九州之一；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以后内地扰攘不宁，宁州遂为大姓爨氏独霸，唯奉内地王朝正朔而已，此种局面直到隋初史万岁南征为止；唐初，积极经略云南，扶持南诏蒙氏统一洱海地区；天宝初，唐与南诏发生大规模战争，关系恶化；在南诏王异牟寻在位时，与唐和好，此后时战时和，直至唐末。

非常明显，上述政治史上的大事表明，在汉至唐的一千年间，中央王朝与云南各民族地方势力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争斗之中，这种争斗从总的局面上来看，是内地中央王朝处于主动和优势，而云南地方势力对中央的抗拒也是长期而顽固的。斗争的结局则是云南与中央王朝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汉唐间云南与内地的这种争斗实质上也是汉族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争斗，这种争斗的结局便是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迅速传播和云南地区各种文化特质的杂然并存与多元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这种文化特色在爨文化和南诏文化中得到了相当鲜明的体现。

爨文化的研究近几年来获得了较大的拓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对于爨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学者间则取得了许多共识。这就是爨文化是指自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灭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称霸南中，至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四百余年间，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创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①。爨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有的滇文化、

汉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①。

笔者认为，爨文化是一种有着丰富内涵、有着浓烈汉文化色彩的地方民族文化。汉文化在爨文化体系中有多种的表现和意义。

首先，汉族移民在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爨文化的创造者是爨地的广大居民即所谓爨人，爨人包括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爨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就是以爨氏为首的大姓势力对南中政权的独霸。而这些大姓，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又无一不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南中地区汉族大姓的由来甚久，远在蜀汉时，汉族移民在南中就形成了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与当地各民族首领联合起来，共同抗拒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故之，史籍中多以“大姓”和“夷帅”（或“渠帅”）相对举而言。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姓势力有更大发展，控制了南中的政局。《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雷、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至于世代独霸南中的爨氏家族，更是内地汉族移民之后。《爨龙颜碑》称：“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标于四姓。”

可以肯定，作为南中地区上层统治集团的汉族大姓对于爨文化的形成、演化及其文化特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四姓以外的大姓汉族移民也对爨文化的基本内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因为此，史籍在提到南中居民时，常用“夷汉”、“夷晋”^②、“戎晋”^③、“宋夷”^④来作为概括性名称。

其次，爨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和鲜明的汉文化要素。这表现在语言、生活习俗、服饰、宗教信仰多方面。

书面语言使用汉文、汉字。著名的《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就是传世至今的明证。而《孟孝琚碑》等不仅文辞雅丽，而且书法卓绝。如《爨宝子碑》“出于蛮滇，……然其高美，已冠古今”，“朴厚

① 范建华：《爨文化刍议》，见《爨文化论》，第22页。

②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③ 《爨宝子碑》，此碑今存曲靖市。

④ 《爨龙颜碑》，此碑今存陆良县。